

馬共陳平投誠的因素探微

羅石圃

遵循毛澤東思想以武裝叛亂奪權的馬共，經過四十多年的苦鬥，終於迷途知返，由其駐在北平的領袖陳平，決定到泰國和泰馬兩國代表簽署棄械投誠協定，從而結束叛亂戰爭，何以致此？在馬共及其支使者的中共由那些因素而形成此項決定？是否另有陰謀？無不值得深入探索。

一、馬共建黨的國際背景

馬共的全名，為「馬來亞共產黨」，因為其建黨時，馬來亞尚未獨立，新加坡和馬來亞都是英國的殖民地，繼後新馬兩國雖分別取得獨立主權，馬共則並未分家，至沙巴和沙撈越加入而成「馬來西亞」，沙共亦並未併入馬共，故其範圍，祇局限于西馬及新洲，但當英倫退出新馬之前在此大力剿共，迫使共黨叛徒在新馬難於立足，因而竄入馬泰交界的叢林，從而卵翼出泰南的泰共，與當時橫行于泰國中北部的泰共相互呼應，造成泰國軍方忙于北剿南征，泰馬雙方剿共聯防乃由此而來。

馬共，萌芽于一九二〇年，至一九三〇年正式建黨，其最先將共產主義向馬來亞播種的，為荷蘭籍共產黨員馬林（MARLING）所培養的陳馬六甲，依照馬林在印尼從事共黨運動的經驗，馬共似應以信奉回教的馬人為主要對象，但實際上馬共則以華人為主體，何以致此？乃由于蘇聯于一九二二年，已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中心（SOUTH SEAS CENTER）以策應馬共，其負責者均由中共派遣而來——繼後衍化為中共的海外支部——「南洋共產黨」，以致馬共吸收的多為新馬華人⁽¹⁾。

在多元民族的馬來亞，華人口僅次于馬人，且執經貿牛耳。當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奔走海外期間，新馬華人無不獻力輸財唯恐不及，至民國成立後，面對國府剷除軍閥，統一全國號召，當地僑胞亦紛紛組成各種支援社團，中共則藉國共合作關係，命其在「南洋共黨」工作分子，分別滲入僑社愛國團體，從而欺騙華僑青年左傾，此乃馬共成員以華人為主體的濫觴。

至一九二七年，國民黨清黨，彭湃所率領的「紅軍」被擊潰後，其官兵多屬閩粵人，遂藉同鄉淵源紛紛向新馬逃亡，從而加入馬共，且將武鬥與滲透顛覆等策略，作為馬共師承。當抗日戰爭初期，新馬僑社支援祖國抗日的社團風起雲湧，中共海外工作，乃以滲透這類抗戰後援團體為首要目標，更形成馬共組織在土著與華人間不能平衡，尤其在日軍進侵新馬前夕，英方所招訓的「華人抗日自衛隊」，在英軍不戰而屈後，更無異為馬共裝備訓練了一支紅軍，這更是它以後強調武鬥奪權及聽命于北平的來由⁽²⁾。

二、馬共叛亂政戰與武鬪並用

馬共的叛亂是武鬪與政戰並行，而後者且以煽動挑撥民族仇恨爲主體，基于馬來亞乃多元民族組成的新興國家，其中乃以馬人及華人爲主體，在英國殖民政府統治期間，由于華人大都從事工商企業，而馬人則大都住在鄉間務農，殖民政府和從事工商業的華人較爲接近，與住在鄉間務農的馬人則由華人從中溝通，使華人和殖民政府有近水樓臺之利，以致當時在海峽殖民地，有「一等英人，二等華人，三等馬人」的諺稱。至馬來亞獨立後，由于憲法的保障，馬人一躍而爲主人，紛紛成爲政府官員，在國會中亦執牛耳，使馬華兩族人民地位互換，華人自不甘心。

尤其在日據時代，日本軍閥爲了對付馬來亞抗日游擊隊，遂利用馬人對華人加以監視，主要監視的對象，在暗中蒐集華人接濟游擊隊的情形向日軍暗中檢舉，當游擊隊得悉其支持接濟者被日軍判罪加刑，乃出于馬人的檢舉而對檢舉者加以報復，從而造成原來和平相處的華、馬兩族人反目成仇。日軍以馬制華政策，認爲對馬來亞華商暗中接濟抗日游擊隊大有收穫，尤其華人抗日游擊隊對馬人檢舉者的報復，形成華、馬兩族人鸚蚌之爭，大可讓日軍于中取利，又何樂而不爲？遂更加的擴大。

日人所倡導的馬來人「泛馬運動」(PAN-MALAY MOVEMENT)——亦即團結馬印(尼)人以抵制華人(3)，遂播下華馬兩族對立的

種子，從而有馬共以爭取政治地位平等挑撥華人，認爲只有推翻吉隆坡新政府方可達成此一目標；在馬人之中，則強調馬人之所以貧窮而華人大都富有，乃由馬來亞的財富，均被華人剝削使然，因此必須排除華人剝削階級方可使馬人不致貧窮。一九六九年的華馬兩族流血衝突，幾使此一多元民族的新興國家解體，便是由此肇端。

馬來亞獨立之初，各種領袖一致認定此由多元民族組成的新興國家，只有佔居民大多數的馬來族和華族及印度人共同執政，方可達成全民和諧，遂有馬人所組成的「巫統」，及華人政黨「馬華公會」、印人政黨「印度大」三族聯盟而共同執政，經過大選而成的聯合政府，已經國泰民安，不料一九六九年大選，竟有華馬兩族人大流血衝突發生，追究原因，乃由于中共所指使的馬共政戰所造成。在此次大選之前，共黨的政戰宣傳，強調「巫統」不惜出賣馬人權益討好華人，聽任他們在此進行剝削；這是煽動馬人必須在大選時杯葛「巫統」的；對華人則抨擊「馬華公會」在聯合政府中，無視于華人權益的犧牲而取悅「巫統」以換取他們的政治地位，呼籲在大選時，只有杯葛「馬華」所推出的候選人，華人的權利才不致被他們犧牲。

在此次大選前，在馬華人所組成的新政黨既如雨後春筍；而馬人所組成的新黨也紛紛出現——尤其是「泛馬回教黨」更形活躍，號召馬人群起將「巫統」推翻由它取而代之，同時中

共除以廣播不斷宣揚在山區的馬共武鬪勝利之外，且以大量的金錢分別支助華人新黨及「泛馬回教黨」，開擴大選戰場，無怪當時的馬來亞總理拉曼，指控華馬兩族的流血大衝突，乃由北平和馬共對華馬兩族人誤導而來(4)。

三、馬國政府的反擊政策

一九六九年大選時所形成的華馬流血暴亂，所幸吉隆坡「華馬印聯盟」政府尚得到了微小的多數席位而能繼續掌政，接著有「馬來亞獨立之父」榮稱的拉曼自動辭職，由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拉薩克繼任總理，從而改變先前跟隨西方的外交路線，加入「不結盟」集團而與亞非新興國家採同樣的外交，使中共了解已有與其建交的可能，從而多方向馬國示惠。基于此一時期英倫在此的屬地于獨立後，諸如沙巴、沙撈越及新加坡加入馬來亞而成爲「馬來西亞」(大馬)，繼後新方雖已退出大馬而自行建國，但沙巴和沙撈越却仍然聯合如初。中共雖堅決不承認大馬，但爲了拉攏吉隆坡與它建交，亦不惜在建交公報中承認「馬來西亞」，並聲言不再支援馬共叛亂顛覆行動。

大馬乘北平聲明不再支援馬共，並約制馬共電台降低抨擊政府的聲浪，吉隆坡又于此際強調馬共已失去北平的支援，從而號召華人放棄寄望由馬共奪權而提高其政治地位的幻想，參加對政府的「效忠行動」——由馬共同路人一變而成爲剿共軍警的耳目，當沙撈越鉅富林鵬壽等廿九人被捕，吉隆坡于取得他們承認多年

來，暗中接濟共黨叛亂的口供，及其願意今後效忠政府的保證後而予以開釋，使當地華人暗中與共黨勾結者紛紛自首，遂迫使沙共不得不主動率領四百多人棄械投誠(5)，由這一啓示，以致大馬與中共建交後，促使在野各黨由先前攻擊執政黨的立場，不得不轉變態度——尤其是華人在野黨，從而響應總理拉薩克的召喚，紛紛加入執政黨聯盟——「國民陣綫」，俾能獲得內閣席位的分配，從而分享政權，使「國陣」由三黨聯盟，迅速擴大到九黨——以至十一黨聯盟的陣容。

基于大馬華人原先認為反對黨已得到北平的支持，在大選中當可獲勝，至大馬已與中共建交，北平連其多年羽翼的馬共都已表明放棄支援，華人在野黨更不會得到其支助，難怪華人在野黨都洞悉此後無法爭取到選民，遂不得不改變立場而加入「國陣」。此項政治作戰，更使馬共在軍事戰綫上，由于鄧普生爵士(SIR ROBERT THOMPSON)——徙置在馬北鄰近山區華人新村居民，形成盤據高山的馬共武裝，喪失了它藉此與城市居住華人的溝通供應綫(6)後又一打擊。

至華人在野黨紛紛加入「國陣」，使先前作為馬共外圍的華人選民和政黨，一變而成為清剿共黨的耳目，其盤據在馬北叢林中的死硬派馬共，便更加孤立，不得不竄入泰南山區。當時泰國對大馬，基于泰南毗連馬北有四府居民，大都為馬裔回民，而「泛馬回教黨」又是以馬北為基地，所謂「泛馬」的含義，不僅在

團結馬人對付華人，且認為凡是馬裔回民居地——無論在泰南及菲南回民爭取獨立，馬國都須予以援助，而泰南與大馬犬牙交錯的北大年、陶公、也拉、實突等四府，居民以馬裔回民居多，而華僑及泰人均在其次。

他們與奉佛教的泰人格格不入，只有華僑雜居其間可通往來，對曼谷政府含有佛教意味的法令規章，往往拒絕遵行，而收聽的廣播多屬來自大馬，尤其成為「泛馬回教黨」爭取的目標，沉迷爭取脫離泰國而獨立或加入大馬，當泰方清剿這批回教叛徒時，「泛馬回教黨」則庇護他們遷至馬北而予以公民資格，便于在大選時為該黨競選者投票，因而造成曼谷對大馬的齟齬，馬共竄入泰南，便是乘此泰方對馬方幸災樂禍心理。

四、馬共逐漸步入窮途

利用泰馬關係不協而竄入泰南的馬共武裝，迨曼谷與吉隆坡都成「東協」的伙伴，藉此區域組織而成為國際間磨擦的潤滑劑，首先是「大馬約制」泛馬回教黨「取消「泛馬」兩字，斷不許捲入泰南馬裔回民叛亂糾紛，從而贏得泰方的好感，繼後又因泰方洞燭馬共扶助泰南共黨，及馬方苦于馬共藉泰南叢林基地，經常向馬北出擊，于是決定了泰馬剿共聯防，雙方軍警可以越境追剿叛徒，造成馬共活動的空間縮小。

在供應方面：原先來自大馬華人的暗中供應，面對中共已聲明不再支援共黨叛亂顛覆，

再證之以沙共棄械投降，顯示先前所企望的有北平為後台的馬共，將可達成奪取政權而為馬華取得政治地位平等目標已經落空，吉隆坡政府既已宣佈擴大聯盟執政陣容，容納多黨共同入閣分享政權，華人何必冒犯政府嚴禁與馬共勾聯禁令而暗中支援馬共武裝？以致龜縮到馬北泰南叢林中的馬共武裝，其原先來自大馬僑社的供應從而斷絕，在泰南方面所倚賴的打單勒索及走私販毒等財源，亦因泰馬聯防剿共，使泰國軍警有保護地方安全的能力，再加上泰、馬、新的聯合緝私及對毒梟的嚴刑峻法，使經由馬共支使的強徒不敢不斂跡而喪失此項財源。馬共在叢林之中的營地，其所以化整為零將駐地分散，乃與謀生有關(7)。

最令在叢林中馬共寒心而萌生棄械投誠意願的：一為泰共盤據泰國北中部山區的泰共，聽從中共指使而紛紛集體棄械投誠，且都得到曼谷履行赦罪安置的保證，此乃表明——中共為了國際反霸統戰——標明「打擊大霸蘇聯，必先反擊越南小霸」，為了籠絡「東協」成員國和它聯手組成反霸陣營，不惜犧牲其羽翼多年的「東協」各國共黨，大馬既為「東協」伙伴國，馬共又豈能不像泰共一樣的被北平犧牲？

其次是越南赤化後與中共化友為敵，旋即引起雙方的戰爭，河內竟遷怒于越南華人，指控他們為中共在越南的第五縱隊，除關入集中營勞改而外，更迫使華人泛海逃亡，這些情況，對「東協」國家華人——包括華僑華裔——尤其其是大馬華人，對先前誤信中馬共黨所宣傳的——

為爭取在馬的政治地位平等，唯有協助馬共奪取到吉隆坡政權方可達成，因此而了然于由中共支援而奪得的政權的共黨，除對北平反目成仇而外，華僑亦相隨遭殃，無怪李光耀喚醒新馬華人「須以越共當權後對華人的虐待為借鑑，為了保持自己在自由地區的生活安定，只有協助政府將共黨清除。」

困居在深山叢林中的馬共，既因此更得不到在自由區的同路人供應，且須加緊防備他們指引政府軍警對其追捕，何況從越共奪取政權後對華人的情況，雖早已親共而為其工作，在中越共交惡後，亦認為他們心向北平而加以虐待，其實越共領導層的成員——如黎笋、范文同、長征、武元甲等都是華裔人，在越南赤化後，亦並沒有對華人的歧視表示同情。由此類推，一旦馬共當權，其本身亦難免不步越南左派華人的後塵。面對泰共的棄械投誠，自不能不認為迷途知返乃為光明的出路。

五、陳平抵泰簽下協定

陳平，是福建籍在大馬的僑民，學歷不高，在馬共陣營中，其所以能于大戰後，由一名繕寫員，迫使非華人的總書記賴特（LIGHTER）在清算中逃亡而由他接替，顯然是得力於中共的支持，方可使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武裝擁戴，當馬來亞取得獨立主權後，他曾代表馬共與吉隆坡政府代表，在華聆從事和平談判，至談判決裂後不久，他便神秘地隱藏，繼後在中國大陸赤化之初，始悉其已潛赴北平作長期羈留

，對盤據于深山中的馬共，仍然遙遙指揮。

據一九八一年從中國大陸逃回馬共基地，由吉隆坡策反而投誠的馬共主席穆沙阿末（MUSA BIN AHMAD）稱：他於一九五六年即奉召前往北平，與陳平經常晤集，曾指出馬共在北平設有機構由陳平主持，他則經常在重慶的「馬列學院」受訓，深入研究高深的馬列主義，除經常代表馬共出席國際會議而外，並不時和陳平與中共舉行雙邊會談，于作成鬪爭策略路綫決定後，即傳達泰馬邊區馬共基地付諸執行，在重慶「馬列學院」受訓的，除馬共而外尚有泰共人員(9)。

馬共陣營的大權，究竟是操在主席穆沙手裏？還是掌握于總書記陳平手中？其實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，馬印人只是少數——僅有第十聯隊屬於他們，穆沙是華聆會談時，馬共為了表示有「華」「馬」「印」三族人都包含在內，乃改組馬共中央——設立中委會主席副主席，由他擔任主席，以印人巴藍為副，其實所謂主席能夠指揮的，只限于馬共第十聯隊（或稱第十團），其餘華人部份，則都掌握在總書記陳平手中，至于他們何以在大陸研究馬列主義高深理論卅餘年，居然違背「槍口出政權」的毛思想而率眾棄械投誠？實在發人深省。

從馬共主席穆沙于返馬投誠後，其所作的說明中，大可窺知陳平萌生棄械投誠心態的歷程：穆沙指出：他之所以對無產階級革命失去信心，甚至無視于其本人在馬共的歷史與崇高地位而決定投誠，乃由他最初沉醉于「國家主

義」，因而堅持在英國統治下爭取國家獨立主權，繼後發覺此種觀念過于狹窄，遂相信必須加入共產黨，始可達成「民族解放」的大目標，從而加入馬共，在接受馬列主義薰陶過程中，更相信在共產制度下，將是公平與公正的社會，不料到達中共統治下的大陸後，他所親身看到的，却是與他先前所憧憬的情況背道而馳。

六、陳平投降心態歷程

當他抵達大陸的當時，適逢「鳴放運動」期間，無數傾吐苦水而作不平之鳴者，無不在繼後「鎮右」的槍口下遭到殘酷的鎮壓，顯示在共黨統治下的社會，使人民比在殖民地統治下的待遇更不公平——尤其許多人的罪名都是資產階級，且禍及子孫，使他們都遭到了慘無人道的酷刑，及因家庭出身成份不良而被剝奪了種種權利，更沒有公平可言，繼後在「文革」期間，中共內鬪益形激烈，甚至不惜唆使廣大青年學生組成「紅衛兵」，鬪垮自己同志以攫奪政權，共黨所強調的「同志愛」，至此已經掃地無餘，馬共主席穆沙從冷眼旁觀，遂感到馬共縱使奪權成功，也不過是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社會，在馬來西亞翻版，其結果，不過是將敵對的奪權鬪爭，再轉變為黨內的惡鬪。(10)

陳平抵達中國的時間與穆沙相同，他所看領略的中共統治和鬪爭情形及感受亦沒兩樣，何況在穆沙回國投誠後，中共的內訌尤其慘烈萬分，譬如劉少奇、林彪等諸酋的慘死，四人幫當權時的殘殺無辜，誠可謂「舊鬼繁冤新鬼

哭」，及鄧小平奪得政權後，再走資本主義道路，掉過頭來和當年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一氣，藉以與蘇俄老大哥反目對峙，並開放沿海大城市，歡迎先前提視為牛鬼蛇神的資本家前來貿易投資，爲了挽救推行馬列主義而造成的貧困落後，不惜實行先前攻擊得體無完膚的走資路線，可見共產黨真是言不顧行，顯示陳平繼穆沙之後所形成的投誠心態，更因這些歷程而感受更深。

中國大陸由于中共極力推行馬列主義，因而造成了社會的落後貧窮，在越南的越共對中蘇共的亦步亦趨，其造成的後果比中國大陸及蘇俄困難尤甚，反觀大馬及「東協」其他國家實行自由民主，無不是一片進步繁榮，而新加坡和香港及台灣、南韓，其進步繁榮，且被譽爲亞洲「四小龍」，兩相對比，便更使馬共領袖陳平，認爲他當年參加共黨以便爭取馬來亞獨立主權，達成他所求的公平公正及繁榮社會目標，使他們昔年視爲反動派的馬來政黨，對這些目標多已達成，而共黨所堅持的無論是武鬥及顛覆奪權，縱使如中共及越共韓共等一樣得到大權在握，其結果只是和理想背道而馳，可見加入共黨只是走入了迷途，棄械投誠，才是迷途知返。

七、中共無視于陳平投誠的經緯

據穆沙指出：馬共在北平設有組織機關，且經常與中共中央舉行雙邊會談，于作成鬪爭策略決定後，再傳達到泰馬邊區馬共基地依照

執行，其間經常來往于北平的馬共幹部都是華人，至於馬人幹部則始終無人到過大陸。就這種情況而言：陳平率馬共棄械投誠，乃由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再加上其本人意願，值得我們探索的——中共何以不惜拋棄其多年哺育而成的東南亞造反伙伴？其間不僅以造反顛覆新、馬的馬共，而且包括了泰共在內，且此次與陳平訂結投誠協議的，只有泰、馬政府代表而獨缺新加坡？這些問題，都值得我們深入探索

先就中共而言：它爲了強化和「東協」國家的反霸統戰陣綫，正如李光耀所警告它的，如果北平不能切斷對「東協」伙伴各國的共黨叛亂顛覆支援，「亞西安」國家在反霸陣營內終會和它分道揚鑣，從它迅即邀請李光耀再訪北平，接著便有趙紫陽分訪「東協」國家，聲明中共與「東協」國家共黨，今後切斷對該等叛亂的支援，只保存政治和道義的關係——（並透露此乃由于唯恐它們倒向越蘇求援，對各國爲害尤甚）。

據傳李氏曾對鄧小平等指出：「東協」各國共黨其所以能夠得到各該國華人的支助，乃由于華人都認爲在北平所哺育扶助而成的共黨于奪得政權後，對華人的政治地位必然會提高，但自越共奪得政權後對華人的酷虐待遇，迫使投身怒海逃亡的越人，乃以華人爲主，居住在自由國家的華人，便不得不轉而支持政府剿共，可見北平對「東協」各國共黨叛亂顛覆奪權的支援，此不僅無法爭取到各國政府真誠的友誼，且亦屬和各國華僑華人成仇，又何能爭

取到他們對大陸的貿易投資？這從趙紫陽聲言李光耀乃爲中共的「諍友」，及李氏曾警告新洲華人——如果大家不能協助政府將共黨清除，便只有和越南泛海逃生的難民一樣，在共黨統治下，投奔怒海！說明李氏其所以能促使中共表明不再支援「東協」各國共黨叛亂奪權並非妄言(1)。

開「東協」國家共黨集體投誠之先的，是泰共，在一九八三至八四年，泰共在泰北及泰東北和中部叢林中盤據已久的份子，紛紛集體棄械歸誠，曼谷亦履行諾言，于昇予他們大赦後並加以安置，據泰國「安全指揮中心」（專責清剿共黨機構）指出：泰共戰鬪員的人數，已從一九七七年的一萬一千人降至一九八三年的三千人，其尚未投誠的，乃屬泰南共黨份子，繼後亦有少數陸續歸誠的，原因是泰南共黨一直是馬共卵翼而來，由于泰南有四府居民多係馬裔回民，早有對泰國的分離運動武裝叛亂，遭到共黨滲透利用後情況更加複雜。所幸泰馬聯防剿共，及大馬嚴禁各政黨庇護泰南回民叛亂份子，至馬共主席穆沙回馬投誠後對馬共號召迷途知返，以致盤據在泰南山區的馬共回教徒繼續歸誠。泰共在南部者亦難免動心(2)，這也是中共促使陳平率部向泰馬兩國投誠的遠因。

衆所週知的，北平爲了籠絡「東協」國家加入其反霸陣綫而不致分道揚鑣，正如李光耀所警示的，便不能不斷絕對各國共黨叛亂的支援，在其反霸陣營內具有關鍵地位的，乃爲泰

國，因為越南挾蘇援棉併寮後，泰國已位居虎口邊緣，對中共揮軍攻擊越北所形成的「圍魏救趙」戰略，曼谷受惠最先，其實北平勸令泰北棄械歸誠，接受泰政府安置，其用心並不止此。

如果我們了解在越南侵棉併寮的同時，並在寮國設有泰共訓練基地，爭取泰共投向越蘇就援，且中共一向藉販毒走私的「黃金路線」——亦即從「金三角」毒品產地，由毒梟從緬、寮、泰山區將雲南及「金三角」毒品向新馬運至海外傾銷，在各地崇山盤據的各國共黨既可為毒梟盡力而獲利，又可藉他們走私而與中共通聯，對中共而言，可謂益處多端，但自棉緬被越南侵據，加上緬共又恃越蘇協力而佔領緬甸佔三分之一的「金三角」區，乃使先前由中共控制的販毒走私勾當，一變而落入了越共手中，以致北平不得不令其在「東協」國家的造反伙伴向政府投誠，此不僅可以因此爭取到這些國家與它聯手反霸，且可免除支援的負擔，尤其在它實行開放政策，號召各國和它增進貿易及投資，更可使各國排除引狼入室的隱憂。

泰國自中共影響泰共棄械集體投誠而後，對北平不僅表明軍事合作，在貿易及投注資金科技各方面，均與年俱增，尤其是讓它假道支援「赤棉」在邊區重整師干，聯合非共棉人反抗越蘇，且泰方又銷售其軍備及允許它在泰設立軍火儲備庫，都不能不歸功于它在幕後安排的泰共集體投誠，對馬共而言：中共所感受到的，此一以赤化新馬泰南為職志的造反夥伴，既然實現無望，且北平對它的支援方面所感到

的困窘，亦與對泰共相同，何況其向外伸展的經貿路線，更須著重于馬、新。故不得不讓馬共步泰共的後塵，集體投降棄械。

「亞西安」國家與中共貿易投資往來，以新加坡居首，而新方向以似乎並無對共黨因此助長其氣焰的顧慮？殊不知新加坡的馬共潛伏份子，自李光耀首次訪問北平前，曾經一次大逮捕審訊，至其訪北平回國後，除將其中十名有大馬籍者送給吉隆坡審訊外，其餘都讓他們在電視招供被共黨吸收及工作經過，並供出其同路人，于是陸續予以清除，所以新方並不顧慮及此⁽¹³⁾，在大馬則不同。

馬來西亞，是「東協」國家首先與中共建交的，在印尼與中共外交關係凍結後，在中共則是對此一區域組織外交關係的突破，不過吉隆坡與北平的貿易往還，始終是由香港和新加坡轉口，至馬哈迪率領大馬龐大的工商代表團訪大陸後，大馬工商界對開擴大陸龐大市場，雖寄望甚殷，無奈馬政府對華人赴大陸的限制迄難放寬，由于華人赴大陸，中共只憑回鄉證即可通行，無須取得吉隆坡在護照上的許可，赴大陸亦不留痕跡。在一九八四年三月間，吉隆坡將未經批准而私往中國大陸的華人公民五十三人的護照吊銷，當時的大馬副總理兼內政部長慕沙，且透過訪馬的中共外長吳學謙，要求北平與大馬就此合作加以阻止，繼後且進一步宣佈：如有私訪大陸者，將被取消公民權，吳某則堅決否認！北平曾對大馬華裔發出過還鄉證，便于他們回鄉探親，更表明中共與馬共之

間，只保持道義關係⁽¹⁴⁾。

很顯然，中共要爭取到大馬的貿易投資，便必須排除馬方對它支援馬共的顧慮，像泰共集體投誠後，曼谷對它的表現，從而經由泰國與它在幕後策劃——如何使陳平代表馬共向泰馬兩國政府簽定投誠議定書，由于馬共武裝盤據地區在泰馬邊區的叢林，由其所卵翼的泰南共黨，其所以不肯隨泰中北部泰共投降，便是基于有馬共的支持，無怪曼谷對安排陳平率馬共集體投誠，與北平的溝通，其熱忱遠超過吉隆坡。

八結 論

令人費解的——是對泰國所安排的招安馬共計劃，最初大馬拒絕參加，指出它不承認馬共，繼後馬哈迪方承認已和馬共間接觸，但終于派出內政部的高級官員和泰國軍方代表，在泰南合艾迎接陳平簽定馬共投誠議定書，何以致此？乃由于陳平所領導的馬共，于一九七五年大告分裂，其中兩個馬列派大肆抨擊陳平所領導的舊馬共為修正主義，新派馬共不再受其指揮，其實此時陳平已在北平羈留，其擁護者則在泰南山區，仍然潛伏在大馬的則為馬共新派⁽¹⁵⁾，這便是馬方先前不願對陳平領導的馬共招安來由，至于大馬最後又何以參加對陳平代表的馬共招安？很顯然是中共已暗中向大馬溝通，說明新派馬共亦早已再在陳掌握之中，至馬共歸降後，是否確已放棄非武鬥方式的奪權？

從其向大馬要求將共黨作為民主黨在大馬活動，被馬哈迪斷然拒絕，及先前集體投誠後的泰共，在繼後泰國幾次流產政變中，都有他們參加，和碧差汶府山洞中所發現的大批槍械，都是當地泰共投誠前所埋藏，準備不久後再捲土重來，可見他們對奪權並不死心，不過泰國已早有「城市安全計劃」，主持招降泰共的泰國三軍統帥植育將軍，並應邀訪馬，對此項計畫加以宣傳，大馬亦已有此對投降馬共的防計畫(16)。

若問中共是否已拋棄赤化亞洲的陰謀——決不再支援各國造反伙伴？由於爲了它本身的處境艱危，加上東歐國家紛紛由共產主義走上自由民主大道，蘇聯不僅不予干涉，其本身亦將步此後塵，無怪新加坡「海峽時報」著論指出中國分隔民主與獨裁的海峽，亦將如柏林圍牆會被推翻(17)，北平在四面楚歌中，所着重的將是如何自保。

註釋

註(1)：「早期馬共歷史之分析研究」，(黎明文化公司)出版，張虎著。

註(2)：「東南亞新興國家」下冊，(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)編印，朱鶴賓著。

註(3)：「華人與馬來亞之建國」，「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」出版，楊建成著。

註(4)：MAY 13 BEFORE, 拉曼著——敘述一九六九年華馬兩族流血大衝突前因後果——「馬來前鋒報」印行。

註(5)：齊簡——「東南亞面對的情勢」，「中國時報」，一九七四、六、十二、吉隆坡航信。

註(6)：同註(2)。

註(7)：「泰馬剿共聯邦的回顧與前瞻」，(問題與研究月刊)，第十卷、第六期、拙著。

註(8)：同註(1)。

註(9)：「投誠馬共主席穆沙阿末電視訪談」，新加坡(南洋商報)，一九八一、元、

八、第六版。

註(10)：同註(9)。

註(11)：「李光耀三訪大陸的不同任務」，(問題與研究月刊)，第廿五卷、第一期、拙著。

註(12)：「泰共集體投誠的背景與動向之探索」，(問題與研究月刊)，第廿三卷、第五期、拙著。

註(13)：同註(11)。

註(14)：香港(星島日報)，一九八四、四、廿四、三版刊載(美聯社)吉隆坡電。

註(15)：「從北平看馬共分裂」，(問題與研究月刊)，第十四卷、第四期、拙著。

註(16)：同註(12)。

註(17)：「海峽與圍牆」，新加坡英文(海峽時報)，一九八九、十一、十四、社論。

公共政策

上下二冊

伍啓元著

上冊 精裝一九八元 平裝一五三元
 下冊 精裝二二五元 平裝一六二元

從多角度並用整合性方法，討論現代公共政策的特徵和種類。敘述其政策過程，研究不同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制度對公共政策的影響，詳細分析政策的決定、執行和變遷。是有關「公共政策」、「經濟政策」的主要參考書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
 郵撥〇〇〇一六五一號
 電話：三一五五三八